关于太平天国的叛降问题

邓 玉 平

十九世纪中叶，在神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成千上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和其他阶层的群众被召唤起来，集合在太平天国的大旗下，向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起义者先后攻克了六百多座县城，足迹纵横十八省，坚持武装斗争十八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把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推向了新高峰。然而，这场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农民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叛降问题不无关系。

太平天国从 1851 年 1 月金田起义之初，叛降问题就开始出现，到了 1856 年 9 月天京事变以后，叛降问题日趋严重，大批太平军将士先后脱离了革命队伍，投降了清军，给太平天国带来极大的危害。本文试对太平天国的叛降问题作一综合性探讨，这对于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全面总结这场农民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都是有益的。

一、叛降的类型

所谓叛降，是指背叛、违背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投降、归顺到敌对方面去的行径。叛降问题在历次农民战争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在太平天国史上表现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天国叛降者中，有王爵三十四人，天将、朝将、神将、主将六十七人，义、安、福、燕、豫、侯(即六等爵)六十人①，其部将、士兵就更不计其数。

这些叛降者，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由于太平军队伍的广泛性、成员的庞杂性，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一些阶级异已分子乘机混入革命队伍。属于这种类型的有苏州大地主徐佩瑗、安徽无赖陈炳文、团练头子苗沛霖、反动官僚子弟熊万荃等人。他们叛降的特点是：死心踏地、出卖革命、拉走队伍、调转枪头。徐佩瑗在 1860 年 6 月太平军进攻苏南时，组织反革命力量拼死抵抗，但旋即摇身一变，混入军中，并受了抚天侯封号。他利用便利的条件进行阴谋活动，不断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竭力腐蚀拉拢太平军将领同流合污，他暗通清军，领回饷银，购置军火，密谋叛乱，是个阴险狠毒的家伙。陈炳文，1864 年 8 月在江西金溪投降清军，为了讨好敌人，他在乞降书中自称“罪名”，恶毒攻击太平天国是什么“广西贼匪猖乱”，恳求“念投诚之意之切，赦罪名既往之愆”，表示自己原先并非甘心投贼，“现有众六万人，洋炮队七千余杆，甘愿效纳，随侍鞭登，进剿残逆。”②

另一种类型是蜕化变质分子。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将领受封建思想侵蚀而逐渐蜕化变质，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革命的叛徒。如程学启、邓光明、古贤隆、李昭寿等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叛降的特点是：贪图富贵、朝秦暮楚、入伙为盗、为敌效劳。程学启始守安庆城外，1861 年 2 月降于曾国荃，配合湘军陷安庆，得到清廷赏赐，以总兵加提督衔，成

为李鸿章淮军第一员大头目。③归王邓光明，原为老兄弟，1863 年镇守石门，竟然为地主阶级撑腰，发给地主沈庆余“护凭”，吩咐其收执保存，“永为保家之定据”。邓光明部下的洋炮队是太平天国的第一支精悍炮队，雨花台失守，天京被围急，调他带炮队来救，不应，1864 年 2 月献石门投降了清军。④

再一种类型是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这部分人在敌人军事进攻下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缺乏信心，动摇、怯懦，他们叛降的特点是：消极观望、看风使舵、乞求活命、归顺敌方。如 1864 年 11 月，扶王陈得才率部同清军激战于安徽霍山，在太平军受挫、战况不利形势下，大批将士投敌，计十八万人，主帅陈得才见战局无可挽回，遂服毒自杀。⑤

还有一种类型也应该指出，抱有幻想的乞降分子。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能够在胜利进军时驰骋疆场，同敌人殊死搏斗，却经不起挫折的考验，在斗争面临险境的关头，由于对清朝统治者的残暴本质缺乏认识，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和部下的缴械作为条件来换取敌人免于诛戮的恩赦。这类人有在大渡河畔被敌包围、进退维谷的翼王石达开，有在“国破主亡”、“天朝之根已去”时身陷囚笼中的李秀成，⑥还有在“子弹告竭、食用俱尽”时，为避免大理“城中老小”被屠杀，服毒后去清营的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等人。他们的乞降决非因为贪生怕死、个人名利。石达开面对枷锁和斧钺，“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神色湛然，无一毫畏缩态”；⑦李秀成被曾国荃“叱勇割其臂股……殊不动，”临刑时“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⑧他们乞降的动机是出于一种农民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是“舍命全军”、“舍身为民”。当然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看起来仿佛是很悲壮的，实际上却是非常错误的，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敌人是不会放下屠刀而发慈悲心的，勇士真诚善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血腥的屠杀，石达开、李秀成、杜文秀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从这几种类型的人数比例来看，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为数极少，但影响极为恶劣，他们投机革命，又伺机破坏革命；蜕化变质分子为数不多，但被“妖魔迷蒙”，“反草通妖”，助纣为虐；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为数最众，在斗争受挫时纷纷投入敌人怀抱。至于个别的乞降分子，他们的乞降行为是应以为训的，但是不能与叛徒们的可耻行为混为一谈。

如此之多的叛降问题，对太平天国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二、叛降的危害性

叛降问题给太平天国带来的危害具体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汇露了机密，动摇了军心。典型的是天京张继庚一案：张继庚是江苏上元人，变姓名为叶芝发，于 1853 年 3 月混入北王典舆衙内，同驻扎在孝陵卫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挂上了钩，不断供给他有关太平军的情报，并约期攻城，自己作内应。张继庚还利用水营都是湖南人，东王府兵皆为广西人，进行挑拨离间以激怒湖南人，水营不少人中计，果结盟谋叛。⑨

第二个方面是葬送了胜利成果和有利战机。如二破江北大营：1858 年敌人的江北大营死灰复燃，虎视眈眈直逼天京，为破之，8 月，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的军事会议上“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联合作战，终于二破江北大营。但是叛徒李昭寿却“以滁州、全椒降，所部均剃发”，“遍插清军旗帜”，⑩并诱使镇守天浦省（江浦）的薛之元叛变，同陷浦口。于是李昭寿自滁州乌衣、小店连营，直抵天浦、浦口，把太平军打垮江北大营的战果化为乌有。又

……洪秀全令忠王李秀成自苏浙前来援救天京。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分兵向秣陵关和雨花台两路进军，10 月 13 日，下令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三万人。太平军把敌人前后左右团团围住，昼夜不息地更番猛攻，打得敌人叫苦不迭，曾国荃说："知尽能索，肆应不暇，濒于危者累矣"。⑪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当时战机都有利于太平军而不利于敌军，如果太平军能够在这场大战中取胜，那么敌人的军事形势就必然"全军瓦裂"。⑫可惜在此大战接近成功之际，李秀成不欲再战，主动撤退。撤退的原因是苏浙根据地的问题使他放心不下：就在 1862 年秋末冬初，常昭守将钱桂仁、骆国忠勾结徐佩瑗叛降的阴谋已经暴露；嘉定又因守将田邦哲的投降而失陷，有鉴于此，李秀成随即退师自救是必然的。结果天京破围战前功尽弃、功败垂成，敌人不过受了一场虚惊。

第三个方面是重要将领被杀害。1862 年 5 月，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失陷后退守庐州，苗沛霖一心想把敌人"苦心焦虑六七年"而始终未能屠灭的陈玉成俘获，作为向清王朝表示忠诚的献礼，于是诱陈前往寿州，英王不虞其诈，遂率兵坦怀入城；结果"中计遭擒"被杀害，年仅二十六岁。在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与忠王为天朝一北一南之擎天双柱，支撑大局"，⑬他"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个好脚色"，连曾国藩也非常怕他，说是"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⑭然而这样一位重要将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却遭到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的暗算。陈玉成的牺牲，无疑给太平天国造成巨大损失，正如洪仁玕所说："一柱即倒"，"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⑮此外，慕王谭绍光、求王林凤祥、来王陆顺德、辅王杨辅清等人也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

最后一方面是名城重镇相继失陷。仅以庐州、苏杭一带为例。太平天国江北重镇庐州，在敌人重兵两年久久围攻下依然屹立，但是由于 1855 年 11 月周得桂等人的叛降，同敌军里应外合，纵火烧城，计守城将士五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庐州失陷。⑯1863 年 6 月，中外敌人分兵三路进攻苏州，苏州城防由以勇敢善战著称的慕王谭绍光坐镇指挥。慕王"站在阵线的最前面"，率领部下顽强抵抗，"勇猛得像一头雄狮，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⑰不幸的是纳王部永宽一伙叛徒却在幕后与敌人进行了一桩肮脏的交易。12 月 4 日，谭绍光于慕王府会议厅召集部永宽等八人开会时，被叛徒刺杀，叛徒们以慕王的头颅和苏州城作为晋见礼献给了清军。亲自目睹苏州保卫战的英国人呤唎指出："倘苏州没有发生叛降事件，即使把外国人对于清军的所有支持考虑在内，太平军也一定可以抵拒敌人，坚守到底"。⑱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苏州的失守，影响了浙江战场上太平军的斗志，一部分动摇分子"从而生心"，纷纷把杭州外围的城镇献给了敌人作了叛徒，如 1863 年 12 月 7 日平湖的陈殿选、12 月 22 日乍浦的熊万荃、23 日海盐的李文楚、1864 年 1 月 7 日嘉善的陈占榜、2 月 4 日海宁的蔡元隆、15 日桐乡的何信义等人。1864 年 3 月 31 日杭州守将比王钱桂仁叛降，杭州失守。苏杭一带的存亡，对于挽救危急中的天京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其相继失守，使天京孤立起来，失去了战略策应、粮食补给地，"得救之望绝少矣"，⑲三个月之后，天京终于失陷。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实说明，叛降问题给太平天国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它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叛降者投敌后的结局会如何呢？一般来说有这样三种情况：其一，奸谋败露，立正典刑。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天国就惩办了叛徒黄梦俊等人，建都天京后，镇压了叛徒张继庚、许连芳，破获了吴长松"勾结妖魔"的反革命案件，叛徒程正瀛作战，即被其部下斩首，徐佩瑗亦被慕王"以洋枪洞其胸而死"。其二，乞求活命，终为敌诛。部永宽等人降敌第三天，正洋洋

得意地将李鸿章赏赐的红花翎戴上，欲入宴庆贺时，“伏兵涌入，立斩八叛徒”，“身首分离，抛尸河上”。⑳李昭寿、张元隆等人为清王朝效尽鹰犬之力，最后仍成为刽子手下的刀下鬼。其三，侥幸逃脱，仍遭唾骂。右军主将韦志俊(韦昌辉之弟)于 1859 年 9 月在安徽池州叛变，天京失陷后一年，他回金田，为了讨好乡里，欲出资修桥，“里人拒弗受”，并刻石碑记其事，唾骂他他为“反骨韦十二”(韦志俊排行十二)。㉑不论叛降者后来的情况如何，他们都受到了应得的惩治。

三、叛降的原因

叛降问题在太平天国史上屡屡出现，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些主客观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农民阶级二重性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具有二重性。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这就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在遭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无可忍耐时，敢于挺身而起，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农民又是一个个体生产的小私有者阶级，同分散的、孤立的小农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又具有保守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他们只有对地主阶级压迫的满腔仇根，却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只能从“人一妖”、“汉一胡”、“正一邪”来区别敌我、判别是非，却不能从阶级本质上划清界限；虽然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却没有认清封建制度的本质。农民阶级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使得他们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斗争中往往容易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甚至走到本阶级的对立面去。列宁指出：“在被剥削群众同少数剥削者进行内战时，总有一部分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一道来反对自己的弟兄，在历史上向来就是这样，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㉒太平天国的叛降者就是属于这“一部分被剥削者”，他们背叛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伙。

第二，农民政权封建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政权是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建立的，当它以完备的政权形态诞生时，特别是定都天京以后，就逐步地封建化了。

太平天国虽然提出了“普天之下皆兄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但搞的却是封建家长制统治。洪秀全声称“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㉓“天下万国朕无二，”他与首义各王则以君臣相处，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㉔太平天国还规定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包括朝仪、服饰、仪卫、舆马、称呼诸项，从天王至两司马，以及他们的亲戚子女，都有严格的规定，稍有违犯，严惩不贷。

经济上，太平天国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但是由于它本身的空想性加之军需浩繁，这个方案颁布不到一年，就转而采取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照旧”就是基本上沿袭清政府的赋税制度，这样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着。农民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利益，如何能与太平天国同心同德？在苏南的常熟、无锡等地都曾发生过农民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冲突，包括捣毁收租局等事件，太平天国脱离了农民群众。

思想上，太平天国虽然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无力挣脱儒家思想的支配和奴

役，如帝王思想、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级名分、天命论、宗法观点等等，浸透于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之中。

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造"人间天国"的过程中，是功勋卓著的，但是随着定都天京，革命性、战斗性大减，他们大兴土木、建造宫府，铺张浪费、享乐腐化，逐渐由农民群众的代表转化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新权贵，农民政权封建化。领导集团的不正，上行下效，产生连锁反应就使得原先官兵一致、团结战斗的太平军队伍"气馁心离"，"锐气减半"，㉕频频发生叛降问题。

第三，政策失误的影响

太平天国政策上的失误表现在：

强迫军民过原始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如拆散家庭、实行男女分居，"虽夫妻同止宿，亦治以极刑"；㉖禁止小手工业者自由经营，集中到"诸匠营"、"百工衙"中为天朝效劳；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圣库制，粮食定量供应，吃大锅饭等等。这些过激政策，人为地制造了社会混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太平军将士及其家人。

防止叛徒措施不力。太平天国在防止奸细、处理叛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把投降清朝称为"变妖"，把叛徒叫做"反骨妖人"㉗，在前期对叛徒的打击是坚决的，但是到了后期，这一工作却不得力。如象李秀成部下发生多起叛降事件，与他"不严其法"，姑息养奸的作法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太平天国在斗争过程中集中打击的目标是清王朝的各级统治者，对于一般地主，只要其表示"归附"即不过问；后来制定的招降政策，对招降者既不进行教育改造也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而是委以重任，结果使有的招降者一旦有机可乘就与清军配合以颠覆天国，这不能不说是个血的教训。

过分注重宗教迷信的宣传。拜上帝教在初期发动、组织群众起来向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后来洪秀全等人却成了宗教迷，沉湎于宗教宣传，宣扬"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㉘并用强制手段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武器，企图以宗教宣传来长期维系人心是不可能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反动性、虚伪性就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天京事变的发生，宗教已经变成为洪秀全等人遂行私意、争权夺位的工具，它在太平军中的威望便一落千丈。当时流传有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㉙这首歌谣反映了天京事变后的人心离散，也反映了太平军将士对宗教信仰的完全破灭，在这样的心态下，出现远离革命，甚至投降敌方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农民政权的封建化、政策的失误，是在农民阶级二重性的前提下派生出来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错误，是叛降问题的主观因素亦是重要因素，同时叛降问题又与历史时代的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第四，敌人诱降及革命形势低落的影响

软硬兼施、剿抚并用，是敌人惯用的反革命两手，清王朝在对太平天国实行军事镇压的同时，从未放松过使用诱降政策。他们对太平军将领以官、禄、德为诱饵进行诱惑，对广大士兵则进行欺骗性宣传。敌人的诱降政策主要对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动摇分子起了作用，当然也使相当部分的太平军将士上当受骗。例如周锡能，清军头目许他以"六品顶戴"，要他潜回军中，搞通"外攻内应"；㉚程学启，曾国荃"知他是桐城人，访得他族中一老妇人，使去劝降"，㉛于是他们投降了。又如，1864 年 5 月常州占役中，"李鸿章用大字写成布告，张贴

在城墙上”，说明“凡自愿弃城投降者，一律免死”，结果，“来归者相望于路”，“每天逃来清军这边的人数约有三百上下”。㉜

革命形势是高涨还是低落对太平军的军心、士气影响极大，而革命形势由高涨走向低落又与太平军面临的中外敌人联合进攻、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一路滔滔，势如破竹”，㉝从一万多人发展到号称百万之众，清军受到沉重打击，叛降问题寥寥无几。但是天京事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在“剿灭发匪”这一共同目标下开始勾结起来，其实力和声势都远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可以比拟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降问题大量出现，到了“天朝失国”、“大势已去”时，更是发展为叛降浪潮，当然叛降浪潮又成为太平军失败的催化剂。例如1864年7月，启王梁成富军与清军激战于陕西之际，传来了天京陷落的噩耗，顿时军心大乱，仅几天时间启王部下连续发生四起大规模叛乱；如前述陈得才部下十八万人的投降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叛降问题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太平军的衰亡史，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

①据张德坚《贼清汇纂》、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陈宝辉《太平天国诸王传》统计。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72页，773项。

③据《清史稿》《程学启传》。

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三卷。

⑤《太平天国诸王传》第298页。

⑥石达开、李秀成未计入三十四名王爵叛降者中。

⑦周询《蜀海丛谈》《石达开》。

⑧《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3页，381页。

⑨《太平天国》第四册第755页。

⑩⑬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1646页，2045页。

⑪转引自罗尔纲《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第287页。

⑫《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⑭《太平天国资料》《刀口余生被掳记略》第207页。

⑮⑲㉓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53页，855页，848页，504页。

⑯㉑㉛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四册，第2691页，2671页，2672页。

⑰㉜《太平天国史料译丛》《戈登在中国》第203页，241页。

⑱呤唎《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05页。

⑳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

㉒《列宁选集》《奴才气》第二十九卷，第498页。

㉔㉗㉘㉚㉝《太平天国》第一册第283页，34页，38页，66页，14页，253页。

㉖《贼情汇纂》。

㉙转引自苑书义《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第117页。